

历代书法经典

张旭、 怀素

方玉杰 编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中州古籍出版社

历代书法经典

张旭、
怀素

方玉杰 编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代书法经典·张旭、怀素 / 方玉杰编著. — 郑州 :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348-6388-2

I. ①历… II. ①方… III. ①草书-法书-作品集-
中国-唐代 IV. ①J29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49852号

历代书法经典·张旭、怀素

责任编辑 贾保倩

责任校对 牛冰岩

装帧设计 王 歌

出 版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编: 450002

电话: 0371-6578869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 / 16

印 张 13.25印张

字 数 217千字

印 数 1-3000册

定 价 36.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张旭、怀素人物评传 /3

第二章 张旭、怀素的交游 /23

第三章 张旭、怀素的草书艺术 /45

第四章 张旭、怀素书法技法分析 /75

第五章 张旭、怀素年谱 /105

参考文献 /109

图版 /111

序 言

张旭、怀素草书的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在中国书法史上举足轻重。两人最大的贡献在于最大限度地冲破“二王”草书的束缚，赋予点画线条艺术以强大的生命力和无限的想象空间，创造了天真烂漫、狂放恣肆的草书。

两人同处于唐朝鼎盛时期，在这个制度完备、经济繁荣、社会昌盛的时期，草书的发展也达到了中国书法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就在这种条件下，同样嗜酒如命而癫狂的张旭、怀素两人敢于打破传统，独辟蹊径，创造了独特的狂草艺术，这是值得大家研究和深思的。

在历史上，关于张旭、怀素的作品人们进行过很多次的争论，也有很多学者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但是不管怎样，两人开创狂草先河的成就和地位是不能动摇的。那些经典的草书艺术影响着一代代书家，那些经典的求学故事感染着一代代后学。孤蓬自振、惊沙坐飞、观看夏云、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屋漏痕、折钗股、观公主与担夫争道、观公孙大娘舞剑器等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劲铁、枯藤、深山坠石、龙蛇奔腾等给人以酣然的视觉艺术；字与字之间的上下引带，行与行之间的呼应摆动，字体大小如珠忽撒玉盘的铿锵，这犹如一首激昂的旋律，给人以听觉艺术的享受。他们将书法艺术与其他艺术相交融，不断彰显着文字艺术的魅力。

本书重点研究张旭、怀素同处于一个时代、同样的性格、同样的结交，然而书风却迥异的原因，从社会背景到个人职业、书学思想、书法师承和传承、交往和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深入分析张旭、怀素的性格和书风，并重点梳理两人不同历史阶段的状况。用对比研究、心理还原的方法，分析两人书法的异同，并对两人书法的代表作进行深入分析，同时通过对经典作品的分析，简要介绍学习临摹两人书法与创作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在本书的最后，还附有张旭、怀素的代表作，原则上，本书将两人的作品按照创作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由于张旭的书法作品存世量较少，并且争议较多，所以本书在选取其代表作时进行了甄别，在尽可能搜集其代表作的同时，在作品后面简要做了注解。关于怀素的代表作，本书重点选择墨迹本，并对选取的一些拓本进行了校注和简析。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本书可能存在错谬之处，敬请斧正。同时，对参考借鉴的作品作者一并致谢。

第一章

张旭、怀素人物评传

一、张旭的生平



图一 张旭像

张旭（675—759年）^[1]，字伯高，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初仕常熟县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一作左率府长史，人称“张长史”。其母陆氏为初唐书家陆柬之的侄女。陆氏世代以书传业，有称于史。张旭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工诗书，晓精楷法，草书最为知名。与李白、贺知章相友善，杜甫将他三人与李适之、李璡、崔宗之、苏晋、焦遂列入“酒中八仙”，是一位极有个性的草书大家。张旭嗜酒，因其常喝得大醉而呼叫狂走，然后落笔成书，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故又有“张颠”的雅称。唐文宗曾下诏，以李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2]。其又工诗，开元初年，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号称“吴中四士”。

二、怀素的生平

怀素（737—799年）^[3]，俗姓钱，字藏真，僧名怀素，长沙（今属湖南）人。幼年事佛，出家为僧，经禅之余，尤好草书。一度客居京兆（治今陕西西安），与诸

[1] 朱关田著：《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

[2]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李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3] 朱关田：《怀素〈自叙〉考》，《书法研究》，1986年第4期。

名士交游。喜翰墨，自言得草书三昧，刻苦习书，将弃笔堆积埋之于山下，号称“笔冢”。早岁家贫，无钱买纸，种芭蕉万余株采叶为纸，号其住所为“绿天庵”。又以漆盘、漆板习字，随写随擦，致使盘、板磨穿。性嗜酒食荤，蔑视陈规陋习，饮酒兴起，寺壁屏障，衣皿器物，靡不书之，时谓“狂僧”“醉僧”。为书法史上领一代风骚之草书家，与张旭齐名，有“颠张醉素”之称。唐裴说在《怀素台歌》中将杜甫、李白与怀素分别称为文星、酒星、草书星。



图二 怀素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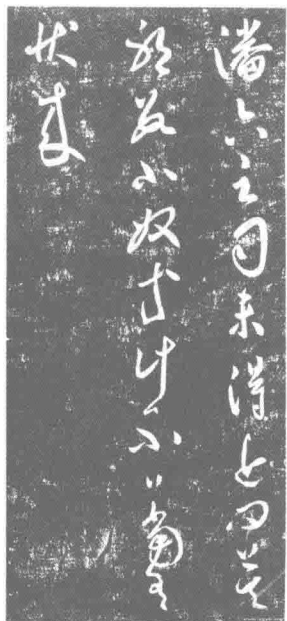
三、张旭、怀素草书风格形成的时代背景

张旭、怀素草书风格的形成有社会大背景的原因，也有自己个人的原因。其中社会原因导致了唐朝浪漫主义书风的出现，个人原因成就了其在草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1) 初唐时期王羲之书风的盛行为中唐狂草的出现做了铺垫

唐太宗李世民，任贤纳谏，锐意图治，并且酷爱王羲之书法，他曾经亲自为《晋书》撰写《王羲之传论》。由于他的重视，初唐时期王羲之书风得到了倡导。唐太宗在位时设弘文馆，诏令五品以上京官，去弘文馆学书，并在民间广泛征集王羲之书迹，命褚遂良等鉴定、编次后藏于御府，并摹拓分赐朝臣。由于他重视书法，许多人因字写得好而做了官，因此，举国上下都以写王羲之字为荣。他在收藏欣赏王羲之书法作品的同时，也常作草书示群臣。其笔力遒劲，势近狂草，有草书《屏风帖》等传世。

初唐还有一些代表性的书家继承了王羲之书风，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流传下



图三 虞世南《潘六帖》，拓本，草书，25.7cm×43cm，《淳化阁帖》卷四收录，上海博物馆藏

【释文】潘六云司未得近问。莫邪数小奴等，计不日当有状来。

来一些代表作品，如欧阳询所作草书《静思帖》，颇为精彩，深得王羲之笔法。宋代米芾《书史》称其：“乃暮年书，精彩动人。”虞世南所作草书《潘六帖》（图三），温润劲健，有二王遗风。陆柬之所作草书《得告帖》，笔势厚重，峻严跌宕。宋代朱长文《墨池编》赞曰：“如乔松倚壑，野鹤盘空。”孙过庭所作草书《书谱》同样深得王羲之笔法。米芾《书史》评其书法：“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初唐时期各书家由于继承了王羲之的书风，草书得到发展，为盛唐时期狂草的出现做了铺垫。

（2）气势磅礴的盛唐文化促使狂草书风出现

唐王朝统一天下后，为了迅速巩固政权，统治天下，在各方面建立了统一的秩序，其中在书法上首先以“唐楷”为标志，统一书写形式。“唐楷”的法度森严是当时社会秩序的一种体现，同时也使唐朝的书法形成了自己的一种风格，也就是迥于晋人书法的“唐楷”书风，出现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初唐代表书家。随着唐朝的政治稳定，经济逐渐繁荣，科技得到发展，文化艺术开始绽放，小说、诗歌、乐舞、绘画、雕刻、服饰等领域也逐渐繁荣。现存的唐代周昉《簪花仕女图》（图四）是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唯一被认定的唐代仕女画传世孤本，



图四 周昉《簪花仕女图》(局部), 绢本设色, 46cm × 180cm

是典型的唐代仕女画标本型作品，最能代表唐代现实主义的绘画风格。画中描绘的是唐代当时贵族妇女的日常生活，表明当时的社会政治比较开明，从中也可以看出盛唐对雍容华贵的审美追求。唐代龙门石窟中卢舍那佛像群(图五)规模宏伟、气势磅礴，其中最大造像卢舍那佛像脸部浑圆，双肩宽厚，衣纹的雕刻使用圆刀法，自然流畅。这座依据《华严经》雕凿的摩崖式佛龕，以雍容大度、气宇非凡的卢舍那佛为中心，用一组极富情态质感的美术群体形象，将盛唐佛国世界充满了祥和色彩的理想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体现出盛唐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代表了唐代雕刻艺术的最高成就。

此时的文人士大夫也有了更为开阔的胸襟，书法文化的风格，也由初唐时期的清健、工稳转向了盛唐时期的沉雄、豪放。通过颜真卿的楷书，孙过庭、张旭、怀素的草书，李阳冰的篆书(图六)，可以发现一个共性美，那就是圆劲雄逸。这些不同书体的艺术美都流露出了强烈的时代特征，即盛唐的雄伟雍容。在书法之外，如李白的诗歌、吴道子的绘画、龙门石窟的佛造像等都体现出这种盛唐气势下的神秘浪漫主义艺术风格。《簪花仕女图》就生动地展现出了唐朝的审美时尚，这正



图五 洛阳龙门石窟卢舍那佛像群



图六 颜真卿的楷书，孙过庭、张旭、怀素的草书，李阳冰的篆书（从左至右）

与书法的饱满逸态相吻合。此时也涌现出了代表书家张旭、颜真卿、怀素等，出现了狂草浪漫主义书风。“特别是草书，他们在继承张芝、王羲之今草，王献之大草的基础上进行大胆创新，以最活跃、最富激情的姿态，在时代的交响曲中，演奏出激动人心的旋律。以写狂草著名的书法家，充分展示了他们的天才和豪情，把草书艺术逐步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1]

（3）道教的盛行促使盛唐浪漫主义书风兴起

整个唐朝，实际上是一个儒、释、道三教既纷争又融合的时期，纷争中有融合，融合中又有纷争。儒家思想宣扬的“忠孝之道”遭到佛教“出世思想”的冲击而处在“中衰时期”。而在唐朝初期，道教就被定为国教，李世民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但是当时“西天取经”“白马寺讲经”和武则天登基后在宗教上削弱“李氏”等又使佛教在社会上占了上风。唐玄宗（685—762年）即位后，重新倡导道教，于是道教在社会上再次盛行，道家的哲学、美学观念逐渐渗透到文学艺术领域，许多诗人学者等都信奉道教，出现了贺知章、李白等浪漫主义诗人。道家的自然观、性灵观以及以阴阳变幻为准则的动态美学思想对书法创作的审美产生了影响，人们不再恪守那种中和的艺术形式与风格，逐渐开始追求那种能够抒写自己纯真性情的草书形式，从而催发了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书风的兴起，把今草艺术推向了时代的顶峰。

在这种佛教、道教转化融合的年代，张旭、怀素的书风既保留了佛家禅定圆静的美学精神，又在这种基础上汲取了道教的纵逸浪漫之风。对于佛教文化色彩的草书创作，二人均有作品留世，如张旭的《心经》、怀素的《四十二章经》等。

（4）时人的推崇促使其名声大振，影响深远

在当时，张旭、怀素的书法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的范围还是有限的，随着当时的官宦、诗人的推崇宣传，两人才名声大振。唐文宗李昂将张旭草书与李白歌诗、裴旻剑舞，诏为“三绝”。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说“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2]，高度称赞了张旭的书法。

[1] 卜希旸著：《草书教程》，北京：华文出版社，2006年。

[2] 《昌黎先生文集》卷二十一，《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写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1]此将张旭那种潇洒自如的状态活脱脱地展现在眼前，并称赞张旭草书“俊拔为之主”“逸气感清识”。李颀在《赠张旭》一诗中说：“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2]可见大家对张旭的推崇。

张旭词科出身，开元年间曾与贺知章、包融、张若虚三人以诗文并名天下，时称“吴中四士”。后张旭又与贺知章、李白、苏晋等人结为“饮中八仙”，饮酒作诗。诸友又对张旭书法进行评价和推崇，其中高适在《醉后赠张旭》一诗中说：“兴来书自圣，醉后语尤颠。”此将张旭那种狂放不羁的状态描写得淋漓尽致。

怀素也得到了时人的推崇。任华在《怀素上人草书歌》中说：“狂僧前日动京华，朝骑王公大人马，暮宿王公大人家。谁不造素屏？谁不涂粉壁？粉壁摇晴光，素屏凝晓霜，待君挥洒兮不可弥忘。骏马迎来坐堂中，金盆盛酒竹叶香。”^[3]记载了长安权贵对怀素的欢迎。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也是草书的重要观众，更是怀素书法艺术成就的重要传播者。“满堂失声看不及”“满堂观者空绝倒”，在场的墨客骚人也纷纷赋诗作颂、临风题咏；前呼后拥的围观人群和山呼海啸般的激赏声浪，自然也更为狂草大师助势助威。今存十四首赠给怀素的草书歌的作者多是当时名士，如曾任潭州刺史后官至礼部侍郎的张谓、时任永州太守的王邕、时任湖南转运留后的戴叔伦、遇赦南游至永州的大诗人李白、名高气盛时贬永州司户的卢象等，都是其草书的观赏者和赞赏者。唐诗人裴说在《怀素台歌》中说：“杜甫李白与怀素，文星酒星草书星。”将怀素的草书与李白、杜甫的诗并称。其中李白更是在《草书歌行》中推崇怀素“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4]。由此可见其当时的影响。

他们生活在一个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历史时期，并积极结交各个领域的奇人雅士、文人骚客。这些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天才诗人、天才书法家们相知相遇，彼此推崇，续写出了中国唐代文艺史的传奇，也使张旭、怀素在这种高雅文艺圈中获得了美名。

[1] (唐)李白、杜甫著，张式铭标点：《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

[2]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百三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3]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百六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4] (唐)李白、杜甫著，张式铭标点：《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

(5) 狂放不羁的个人性格成就其书法艺术

张旭、怀素能把书法艺术升华到用抽象的点线去表现书法家思想情感高度的艺术境界，这与他们的性格是有很大关系的。在书法艺术中，张旭、怀素的字貌似怪而不怪，关键在于点画用笔完全符合传统规矩。可以说，他们是用传统技法表现自己的个性，而在书法上成为有创造力的无愧于自己时代的书法家。其纵逸豪放之处，远远超过了前代书法家的作品，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和感染力。张旭嗜酒如命，“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1]。酒在张旭看来是精神放松的良药，他将心中的“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借酒借草书发之。寓酒于书，无拘无束，放纵自由，是对心灵的彻底解放。张旭为人潇洒倜傥，卓尔不群，常与宾朋、名流雅士在太湖边喝酒，不知醉与醒，曾有人送雅号“太湖精”。有时又一直喝到腹泻，经常喝大黄汤药，他在《肚痛帖》中写道：“忽肚痛不可忍，不知是冷热所致，欲服大黄汤，冷热俱有益。”

古代的规矩礼仪压抑了人性，做官者整日如履薄冰，小心谨慎。当时志高气傲的张旭也只有借酒来释放艺术的创造力，把清醒时所畏惧的、诚惶诚恐的、俯首听命的东西，乃至书法传统中的规矩都屏之心外，抛弃一切理智，用笔墨来宣泄生命，从而形成了“出鬼入神，惝恍不可测”的狂草风格。

怀素生活的年代，正是唐玄宗抑制佛教，道教再次盛行的时代，开元二年（714年），唐玄宗下令削减全国的僧人和尼姑数量，一万二千多名僧尼被还俗。怀素作为一名僧人，虽并未还俗，却借助时风，释放心灵，食鱼饮酒，蔑视清规。他“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襟气”。作为少年和尚，当场表演，场面浩大，挥洒自如，狂姿逸态，为好僧之俗客喝彩叫好。他将这种挥洒作为一种快乐，在大家的喝彩和欢呼声中得到满足，他的这种“快乐来自一种成就感”^[2]。

唐代许瑶云：“志在新奇无定则，古瘦漓漓半无墨。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任华在《怀素上人草书歌》中写道：“一颠一狂多意气，大叫一声起

[1]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二百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2] [美]戴尔·卡耐基著，刘津译：《人性的弱点全集》，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年。

攘臂。挥毫倏忽千万字，有时一字两字长丈二……”朱逵写道：“笔下惟看激电流，字成只畏盘龙去。”^[1]

今通过《藏真帖》怀素自言可知，似以大历七年（772年）洛下与颜真卿论书为限，其后敛入规矩，用笔稳沉，不见有“迅疾骇人”之状，更不见好事者称狂言奇的应景论书诗篇。至晚岁，怀素经历了“安史之乱”，唐朝“开元盛世”的景象日渐衰退，李白、颜真卿、张谓、戴叔伦等人相继谢世，知心者少，索书者多，年老体弱，久居寺院，故怀素终复归平正，寻求圆静，在零陵写下《小草千字文》不久，他就圆寂了。《小草千字文》在今天成为研究怀素草书书风转变和佐证其生辰年的重要作品，更是怀素笔下草书对时代特征转变的反映。所以说，张旭、怀素的书法共性，内因起到主导作用，同时也脱离不了强烈的时代氛围。

四、张旭、怀素行为艺术的差异

在张旭、怀素传世的书作中，可以看出不管字的结构如何变化，二人谨严肃穆，深得魏晋遗规，求其变化而于法度之内。可见张旭、怀素的书法，狂而不怪，放而有矩，是在深厚的传统功力基础上表现个性的，这种个性正是我们常说的关于继承与创新的书学成果。那么这种狂放的草书艺术成果，表现在他们的创作过程中又有何不同？这还得从二人“颠”与“狂”的不同谈起。

（1）张旭何“颠”？

唐张怀瓘《书断·张旭》：“饮醉，辄草书。挥毫大呼，以头搥水墨中，天下呼为张颠。”《旧唐书·文苑中列传·贺知章》：“旭善草书，而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时人号为张颠。”可知，“张颠”的称号在当时已为风雅。那么，“颠”字究竟为何意？在《辞海》中，“颠”通“癫”（古同），

[1]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百四、卷二百六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曰“颠狂”或“癫狂”，形容神经错乱，精神失常，言行异常，也有言行不庄重之意；作动词时有“颠倒”“仆倒”等说；作名词时有“头顶”之说，泛指高而直立的物体的顶端，此时“颠”字又近义于“巅”字，有顶峰之意。

这些“颠”意，今究之，皆可与张旭相匹配。一个饮酒后神情恍惚、精神高涨的人用头发蘸墨，倒置于纸上疾挥而就，所书过程异于常人，可谓前所未有。且书作极富观赏艺术价值，此等行为举止，唯有“颠”字形容恰当，这种创作与书作俱精彩的展示手法，无疑将张旭推上了草书时代的巅峰。

张旭的这种举动，恐怕更多的是一种行为艺术（图七）。因为，张旭为官有俸禄，经济生活上不至于太窘迫，张旭又有“酒仙”雅称，“酒仙”也并不是真醉得一塌糊涂，而是在微醺中释放心性。其贵为“饮中八仙”，想必不会醉至混沌糊涂，且古时候的酒缺少蒸馏技术，度数较低，大部分酒的度数在 7° — 15° ，有解渴的功效。如《水浒传》第十六回杨志押送金银担过松林时，众军见一担夫卖酒，便欲买酒止渴解暑。由此推测，当时的酒极其类似于我们今天喝的啤酒。试看，我们身边的好酒朋友，喝啤酒大多饮至腹胀，也只会达到微醺状态，谈何大醉？故此似醉非醉间，



图七 当代书法行为艺术写照。二人的行为皆是在模仿张旭的“发书”，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当年张旭酒后的癫狂之态